

如果西安事变不爆发（一）

芦笛

此类猜想，犯了史学界大忌，人家的第一戒便是“历史不可虚拟”。那“不可”到底是“不可能”，还是“不应该”却忘记了说。如果是前者，那乃是废话一句；如果是后者，则我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不应该，棋手们不是都兴“复盘”么？棋都下完了，就算发现了当初走错了哪个关键一着又不可能悔棋，还有什么意思涅？

所以，愚以为，此类虚拟，其实是一种旨在检讨当时政治家们的错失的复盘，具体来说就是确定蒋中正作为亡国之君究竟应该承担多大责任。他恪守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承诺当然是千古大错，但如果亡国终不可免，则这大错似乎也就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严重了。

另外一个意义“还原历史”网友已经指出了。因为毛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让国家至今生活在走不出来的阴影中，有识之士痛定思痛，便要反思“我们怎么会混到这个地步”，竭力从人文传统中打捞出“必然性”来，我自己就一直在这么干。那位老友的水平，恰在于他点破了中国陷共的客观“必然性”。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看了我的《中苏恩仇系列》得到的启发，无过，这老小子是真有水平，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东西。如果真是他说的那样，则我们的主观责任似乎就减轻了许多——反正老毛子亡我之心不死，你国民性再好也没什么用不是？

废话说完，现在开始我的“复盘”，请诸位帮看看有无道理。

第一，如果西安事变不爆发，张少匪不叛乱，则共党问题会被一举解决。

我想这前景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牢里放了出来。”这话说得远远不到位。西安事变何止是把共党从牢里放出来，它完全是生死人而肉白骨。

西安事变前，国府经过几达十年的努力，终于肃清了全国各地的赤祸，把全部红军共三个方面军压缩到陕北一隅。红军当时总数大约七万多人，挤在陕北那种地瘠民贫，人口稀少，拉屎不生蛆的地方，二、四方面军刚完成了爬雪山过草地的万里长征，疲惫不堪，大部分将士还穿着南方的单衣，北国冬季的到来，使得成批战士冻饿而死，洛甫为此向苏联主子要钱，在给上海发的电报中绝望地呼唤，说什么钱晚来一天就要多死许多人，读来使人惻然。从地理自然环境来看，陕北根据地绝对是死地，北有大漠，西有马步芳，东面南面有中央军，即使国军不步步推进，那地方也绝对养不活这么多军队。

更严重的是共军在宁夏战役中遭到惨败。为了“打通苏联”，通过定远营挺进到中蒙边境接取大量军火，中共在获得主子批准后发动了该战役。但四方面军两万多人（几达全军三分之一）刚刚渡过黄河，就被迅速推进的胡宗南部占领了渡口，将红军分

割为两部。河西的红军后来改名为“西路军”，准备长征到为苏联另一走狗盛世才控制下的新疆去，领取苏联在那儿提供的大量军火，后来在甘肃被二马全歼，连徐向前都是只身讨饭逃回来，只有极少数命特别大的同志走到了新疆。

河东红军更是陷入绝境。国军完成了铁壁合围，从各个方向步步推进，将红军压缩在一个几无回旋余地的狭窄地带，根本不可能进行我军最擅长的运动战，只能面临灭顶之灾。当时形势之绝望，从洛甫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一眼就能看出来。中共中央原来还在考虑放弃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长征，经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兜一大圈再回到陕北来，几天后就连这集体突围的可能都没有了。洛甫在西安事变前给共产国际的最后一份电报中，坦率承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分散突围去打游击。

所谓“分散突围打游击”，乃是“被歼灭”的好听说法。突围一般都只能是集体突围，亦即主力集中在一起冲出包围圈。虽然在突围过程中一般要蒙受重大损失，如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时几乎损折了一半兵力，但毕竟主力部队还没被打散，还具有战斗力，遇到危险时能集体拼命。而分散突围则是部队解散，将重武器扔下或是毁了，化整为零，数人一组或甚至个别人趁夜深人静，从包围圈的空隙中渗透出去。这万般无奈的战术其实全世界通用。美军小股部队在朝鲜战场上陷入重围，抵抗到毫无希望时，指挥官也会下令：“Everyone for himself!”那意思就是“事已至此，回天无力，大家各自分头逃命吧，诸位已经不再受军令约束了。”

就算我军有部分人员“分散突围”成功，去“打游击”，那也无非是散兵游勇，就算不被国军在事后必然发动的清剿消灭，也无法在短期内再汇聚到一起，成为有起码规模的武装力量，只怕连地方民团都打不过，更不可能去充当中共中央的保镖。因此，军队的毁灭必然意味着党中央的毁灭。彼时苏联尚未打通，中央决不可能徒步穿过大漠逃到苏联去。

就算逃到又如何？恰好赶上苏联 37-38 年的大清洗。须知斯大林的大清洗并不限于苏共，各国党魁一样挨屠刀。共产党的惯技是每在遭到重大失败时就要抛出替罪羊来，把所有的过错赖到当初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走狗头上去，以证明领袖永远不会错。毛泽东前的所有下台的中共“路线错误头子”自陈独秀以下，无一逃过这下场。如果敬爱的党中央真的逃到苏联去，只怕立刻就要被打入卢比扬卡天牢。斯大林猜忌成病，一定会把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打成日本间谍，指控他们蓄意违抗国际的三令五申，拒绝与国府合作共同对日作战，故意造成中国抗日革命武装的毁灭。我党领袖只会在受尽 NKVD 那匪夷所思的毒刑后乖乖招供，在 show trial 之后被枪决。能活下来的大概只有最善于反戈一击的周恩来。苟如此，则逃往苏联还不如向国府投诚。

因此，无庸讳言，我党我军在西安事变前已经实实在在地濒于毁灭。这绝非夸张之辞，乃是我党领袖张闻天同志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坦率承认的。这其实也就是张学良要发动兵变的原因——他再不动作，共产党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但如果蒋介石不亲自飞往西安督战，自投罗网，则张也只能坐视我党我军彻底毁灭。

即使是西安事变爆发了又如何？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在很大程度上犹如袁世凯称帝，事前以为一帆风顺，应者云集，不料事件一出顿成全国喊打的过街老鼠。张杨事前

曾以苏联援助为诱饵，拉拢了西南军阀和山西军阀，准备公开发动倒蒋风潮，实行“西北大联合”。不料事变后立即招来全国舆论同声谴责，其中最有名的是北京六位大学校长强烈谴责张、杨的通电。更重要的是，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连续发表社论，将事变谴责为日本的侵略阴谋。张原来拉拢的军阀见势不妙立即反水，而张原来指望滚滚而来的苏联援助顿时成了泡影。东北军和西北军全靠国府发饷发军火，根本没有自力更生可能。事变成功的唯一希望是苏联援助，苏联既然拒绝提供援助，那事变就绝对没有成功希望。所以，即使宋美龄宋子文不去西安代老蒋接受城下之盟，因为中共奉了莫斯科严令，张杨也不敢杀了老蒋，最后还是只能乖乖放人。

即使老蒋作了承诺又如何？他反正没签字，全是两宋代他空口许诺。而且，中共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早就把两宋的秘密承诺公诸报端了，为此还受到共产国际的严词谴责。既然中共不讲信义，他又何必拘泥于腐儒小信？

西安事变使得蒋的威望旦夕之间在全国骤然上升。半年前两广事变同样是反蒋，舆论还颇同情西南军阀。西安事变时全国舆论则完全是一边倒地严词谴责张杨。蒋回到南京后，全国人民如释重负，各大城市自发张灯结彩庆贺。这种景象自民国成立以来还从未有过。似乎可以说，蒋乃是清帝逊位之后的第一个全国领袖，而这地位的形成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

更重要的是局势此后发生的急剧转折极度有利于国府。张被扣在南京后，东北军发生内讧，亲共军长王以哲（Oops，几乎打成“王希哲”）被叛乱军官打死，余部纷纷哗变，旦夕之间就消解为无形，被接防的中央军轻易改编移防。杨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国考察”，行前向中共领导谴责莫斯科出卖了他们。形势如此大好，蒋介石在获得从未有过的崇高威望后，在中央军大举进入西北之后，要恢复剿共平叛战争丝毫不难，也不会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他只需以“恢复西北秩序，肃清发动叛乱的日谍”为口号，就能顺理成章地完成未竟之业。

前文根据中共档案披露的史实指出，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已经处于绝境，蒋介石“再有几个星期就能解决剿匪问题”的估计离事实并不太远。如果西安事变不爆发，则红军必然会被歼灭。红军完了，中共中央也只能跟着完蛋。即使逃到苏联去也只会被斯大林当成替罪羊，死在 37—38 年的大清洗中。就算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推翻两宋代他作出的秘密承诺，在解决了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后恢复剿共，以他因事变而获得的崇高声望，以及张杨和中共在国难当头之际劫持国家领袖引起的国民普遍愤怒与不满，剿共平叛战争不可能引起太大的舆论抨击。那彻底解决中共问题顶多也就只是推迟半年到一年的光景而已。

如果历史真的如此发生，中共被彻底消灭了，那接下来的历史行程会怎么样呢？中共是否还会如我那位老友说的那样，被苏联人扶植上去，最终征服全中国？

我看未必。

愚以为，改变世界史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中日战争，它决定了二次世界大战双方的组

合。人们回溯历史，难免把已经发生的事当成必然发生的事，所以很难设想二战双方并不一定非是后来那个组合不可。决定二战结局的关键参战国是美国，而美国总统罗斯福之所以能突破压倒一切的孤立主义，找到参战借口，乃是日本人愚不可及地袭击了珍珠港。而日本人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它为了迫使重庆投降，在占领了大量中国领土后，还为了封锁中国出海口，接管法属印度支那，激化了英美矛盾使然。没有中日战争，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后来的世界恐怕也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和英美并无什么过节，反倒和老毛子频频别苗头。其时日本已经走上了难以逆转的军国主义道路，那憋足了的武力总是要发泄出来的。日本大本营内从来有批少壮军官主张打苏联。所以，若日本不和英美交战，很可能会去打苏联。纳粹反正是要打苏联的，这蓝图早就写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了。德日联手进攻苏联，罗斯福又没有理由违反民意参战（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压倒一切，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赌咒发誓，他决不会把国家领入战争），只能看着干着急，则苏联非垮不可。苏联垮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共或其他任何X共在全世界捣乱破坏了。国际共运之所以能从一种思潮变成现实的灾难，完全是因为它有一个大国资源支撑。此所以美国今天不能从伊拉克撤军，一旦国际恐怖主义获得一个中东大国资源的支持，那前景真的不堪设想。

如果历史真的如此发生，那么，今日世界就是德国、日本和美国三家的天下。中国可能变成三四个国家，满洲国大概是工业强国，江南国的文化最发达，生活也最富裕，中原国（华北）就比较没有搞头。蒙古国和土耳其斯坦（新疆）最差。无论是哪个国都由亲日派掌权，日文可能是学生必修的外国语，教育科研文化事业的学科带头人都是留日海龟。

这情景不知道是否有人喜欢，不过窃以为，即使如此恐怕也要比我党统治强，虽然我只是在理智上这么认为，感情深处实难接受。

但这情景发生的概率实在太小，在我看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蒋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抗战并不是某些海外学者指责的那样，是蒋介石去“抢来的战争”，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我当在纪念蒋公的文字中加以重点评述。中日既然交战，那历史当然是顺着已知途径走下去，也就是苏美英为一方，德意日为另一方开战，以前者大获全胜告终，所差者只是少了中共的华北和苏北的“解放区”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则国府在苏联出兵前和苏联谈判的立场就要强硬得多。蒋介石之所以决定放弃外蒙，主要是怕苏军把东北交给中共，为此以出让外蒙为代价，换来斯大林把东北移交给国府的承诺。斯大林一开头也遵守了这承诺，苏联红军甚至一度武力驱赶进入东北的土八路。但后来美苏冲突加剧后，斯大林怀疑美国想控制中国，便扶持、武装、怂恿中共在东北放手和国军大打，以此报复亲美的国府。这才鼓励了原来野心有限，只想“到联合政府里去做官”的毛泽东，使他最后决定席卷全国。但即使是这样，斯大林在表面上还是信守国际承诺，将东北“交”给国府了。至于在“移交”前东北早成了关内八路的天下，以致国军必须沿铁路北上攻取各大城市的实情，则被斯大林赖成是“中国内政不便干涉”。

不难想见，如果中共早在抗战前就被消灭了，则斯大林根本就没有这借口。因为挨

了原子弹，日本反正是要投降的。斯大林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一定会入侵东北，但国府未必会签约放弃外蒙，只会日本投降后联合美国要求苏军退出中国东北。其时苏联没有原子弹，斯大林老奸巨猾，在国际上历来搞弱肉强食、欺软怕硬的强权外交，不大可能赖着不走，顶多只会从苏联带回“抗联”残部诸如周保中等亲苏土共，试图割据东北。但那些人人数太少，在国内毫无影响，不可能扶植上去。因此，东北变成北韓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概率不大。

三北的其他地区则没有那么乐观，在我看来，新疆的一部或大部要失去，在苏军扶持下成立“人民共和国”。国府不会同意割让外蒙，但也没有实力收复之。内蒙的一部或大部也会陷共，很可能与外蒙合并。国府没有实力收回这些地区，仅能保住东北。

这就是在减去中共这个政治力量之后最可能出现的（也是最佳的）图景。苏联这些侵略活动，必然刺激国府进一步倒向美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国府一定会按原计划实现宪政，使得中国走上民主道路。苏联虽然亡我之心未死，但要颠覆一个大国，而且是经过抗战实行了军政统一、消灭了战前军阀割据的大国并非易事。中共以前之所以能够勃兴，靠的完全是辛亥革命砸碎了全国，这才能在军阀混战中幸存下来。

由此看来，如果西安事变不爆发，中共给消灭了，则后来中国可以争取到的最佳前途要比现在的光明百倍。

这虽然是最可能的前景，但并不是必然前景。关键还是取决于美苏两国的较劲。光是中国一国，是绝对抵挡不住老毛子侵略的——咱们连日本人都抵挡不住，何况是比小日本更强大更狡猾的老毛子？主要还得看老美的态度如何。东北为老毛子垂涎已久，国府要请苏军撤退，不烧纸钱送瘟神恐怕不行。但蒋介石乃是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没有国内共祸的威胁，要他同意割让外蒙换取苏联撤兵恐怕办不到，于是苏军就有一定可能长期赖在东北。

能否强迫苏军撤出，此时便完全取决于老美是否强硬。但老美战后孤立主义思潮再度发作，又是民主党当家，而且他们历来重视欧洲，当时正忙于在那儿抵抗苏联的侵略，美国政府又对国府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很可能懒得管中国闲事，采取绥靖主义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苏军有一定可能长期赖着不走，直到在当地扶植起来的汉奸政权羽翼丰满了，宣告了独立并和苏联结成了盟国，才将主力撤回。

类似的情景很可能会在西北和内蒙上演，因此，中国有可能回到明朝边界去。至此斯大林的侵略野心就会满足了。他其实并不想支持土共吞并全中国，那对他反而构成威胁。对他来说，最理想的格局就是沿中苏边境建立一系列（不是一个）的亲苏缓冲国。因此，中国的三北不会变成一个国家，只会是三个“独立”的“人民共和国”。

这是中国可能出现的次佳前景，我看这也很不错，不知诸位觉得如何？当然老非老东西不会干：）

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上述前景出现后，国府因民意压力被迫试图收复失地，和那些“独立”国家开战。苏联根据攻守同盟条约出兵大败国府，让汉奸国家席卷了整个北中国，

再与国府签订城下之盟，使得中国再度出现南北朝。疆界可能是南宋式的以淮河为界，也可能以长江为界，但没有可能席卷全国。理由上面已经说过了，斯大林不愿。

这个可能性在我看来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非常之小。

综上所述，如果抗战前蒋介石消灭了中共，那么无论后来事态怎么发展，即使是在最坏的南北朝的情况下，也有相当比例（应该说是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逃脱了共祸。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这都要比全国被共产党统治强多了。当然老克（book）不会干。他已经说了，若事情真是这样，则他要跟随伟大领袖畅游长江，逃到江南来。

无论是上述三种前景的哪一种，可以断言的就是，为共产党控制的区域经济一定会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而南方的自由中国迟早要实现经济起飞，让不幸沦于我党铁蹄之下的北中国人羡慕得要死。于是南北中国就很可能如同东西德一样，随着苏联老大哥的垮杆而和平统一，那么全民的生活都要远比今日幸福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蒋介石在可以而且应该消灭中共的时刻没有这么做，的确是对全民犯了罪，身受其害的中国人有充分的道义资格为此谴责他。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似乎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他修习王阳明理学，恪守两宋在西安代他做出的秘密承诺。事实上，那承诺基本都被他推翻了。参加事变的三方有两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惩罚：张学良被终生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和西北军先后被解决。唯一没有遭到清算、反而获益的就只有中共。蒋不但没有恢复剿共平叛战争，反而还让密使传话，请中共放心，他一定会停止剿共战争的。他竟然看不出来，真正具有危害国家民族的强大潜力的不是那两个军阀，而是信奉可怕邪教并有苏联支持的中共。放过了老虎去拍苍蝇，如此昏悖的倒行逆施，在他的生涯里还难得见到。

更奇怪的是，中共在放蒋后，因害怕蒋反悔，曾愚不可及地在其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周恩来版的“蒋介石的承诺”，等于是公开羞辱蒋介石，为此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然而蒋在受到这种公开羞辱后，仍然矢志不移地信守了两宋代他作出的口头承诺。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便再没进行过剿共平叛战争。

很明显，“讲信义，重然诺”并不能解释这奇怪现象，否则蒋也不会惩罚发动事变的张杨了。这在我看来，似乎只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蒋介石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怀，使得他在中国面临深重国难、走投无路之时，把唯一的希望押在了老毛子身上，指望与之结盟，共同对付咄咄逼人的日寇。

须知当时列强对日本肆无忌惮侵略中国的态度很漠然。国联虽然通过决议，谴责日本侵略东北，要求日本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但那不过是个空洞的姿态。英美都有许多人对辛亥革命引发的无休止混乱彻底厌烦，觉得中国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不如让日本人去代管还能恢复秩序。日本当时和英美关系都不错，国际上和日本势同水火的只有苏联一家。

蒋介石深知，以中国积弱之身，绝无可能与日本正面对抗。但避战总是有限的，妥

协必须双方有合作诚意才能达成。他不能不为中日全面战争作准备，在国际上找一个强大盟国。他根据日俄战争的历史经验，判定日苏战争迟早要爆发。因此，为中国前途计，当时唯一的选择便是联俄制日。这其实是李鸿章当年外交战略的重施，似乎也是弱国外交的唯一选择。毕竟，一个弱国要想在帝国主义时代活下来，就不能不靠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讨生活，搞所谓“以夷制夷”。

就是为此他才决定对中共网开四面，慷慨地施以不杀之恩，那完全是打狗看主人面，幻想着通过中共巴结上其主子。此外，国共本出一家，他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并非毫无共通之处，只是激进程度有别。他对中共的危害其实没有深刻认识（这也可以原谅，没受过那种罪就不可能获得芦某这种深刻的理性认识），与中共的冲突有如说是理性认识使然，莫如说是对苏联控制中国的反抗。当他对苏联援助的盼望超过了对苏联侵略的仇恨时，自然也就改变对苏联代理人的态度。而且，从“大革命”时代起，他就深知共产党人的宗教精神带来的战斗力。如果共军同意改编并接受他的指挥，在未来的抗日战场上未必不能成为铁军。

必须指出，当时持这种幼稚错觉的人相当多，宋子文就主张联共抗日。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我党再教育，不知道共产党人根本不是民族主义者，从不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念，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其实也可以理解。若我辈未曾受过我党荼毒，又岂能有今日的觉悟？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未便苛责前贤。

可以责备蒋的是，他应该从李鸿章“联俄制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俄国才是中国最大的民族敌人，比咄咄逼人的日本人狡猾阴险百倍，更是中国自五四以来处于持久动乱的祸首。套他的话来说就是“日本人是皮肤病，苏联人及其走狗才是心脏病”，实在不该饮鸩止渴，再蹈李氏覆辙。

这就是他何以惩罚张杨而放过了中共。张杨虽然表面上的兵力远远超过共军，但既不是具有高度战斗力的宗教军队，又没有强国作后台，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没有多大用途，完全可以牺牲。此外，张杨是他的下属，而中共一直是他的敌人，下属反叛引起的痛恨当然要比敌人趁火打劫引起的痛恨强烈得多。于是历史的关键一步就这么走错了。中国跌入深渊，乃自双十二事变那天始。

（全文完）